

任宣传，熊子良任工运，周国干任军委。川西行委成立后，省委要求立即行动，马上要搞广汉起义。搞起义是个大事情，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广汉驻军是一个旅，各级指挥员怎样配备，谁去当旅长，三个团谁去当团长等等。我们在军队的人上层不多，只有陶宗伯是个团长，曾学圃是个营长，上层总共就这么多人。士兵中有一些党的组织。当时有个怪政策，士兵起义上层同志不能参加，怕他们不坚定，怕他们作怪。这些人又如何处置？我们认为，广汉起义马上要搞不行，起码要延长一个月再说，这么急，搞不下来。后来省行委算是同意了这个意见，推迟了。

广汉起义，谁去带兵？周国干当过团长，从苏联留学回来就搞军委，是老打仗的，带兵有经验，但他情绪不高，知道起义要失败，不大愿意去，组织上不好硬要他去，只好算了。车耀先是个跛子，也不能去。所以就找了廖宗泽、徐超俊，他们两个都是黄埔学生，就叫他们两个去负军事责任。另叫廖恩波负党的责任，因为他原是川西特委搞组织的，他去最合适。其他政工机关和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派了一大批学生同志去，这批人中有曹荻秋、刘连波等，当时他们都是才从学校出来的，他们到部队是去当基层的党代表。还有一些士兵党员，派去的人和他们如何分工、安排，哪个兵在哪个活动点，哪个兵当连长，哪个兵当排长，就叫廖恩波等根据情况去安排。川西行委确定总的由廖恩波负责。起义前，先把学生同志叫起来搞了一点训练，主要是由周国干、车耀先先讲一些军事常识。当时还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起义搞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把部队拉到哪里去？向大巴山活动，要通过田颂尧的防区，路途远，拉不过去；到酉、秀、黔、彭同贺老总的部队联系，要过长江，而通过刘湘的防区，也很困难；川南

是刘文辉的大军所在，也不能去。所以就决定依山游击，打不赢就上山去，反正不做无谓的牺牲，找机会下山出击。广汉起义最后是失败了。十一月，程子健同志来成都开会作了总结。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省委遭受了重大破坏，刘愿庵、吕维新、李鸣珂等同志先后牺牲。一九三一年春，省委迁成都，罗世文任书记，旧省委委员只剩我和程子健两人了。我任宣传，程任军委，另有个史伯康，任秘书长，班子已不全了。下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搞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这时，国民党改组派在成都很活跃，他们提出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颇有欺骗性。他们甚至在少城公园搭起了两个花花绿绿的台子，在重要街道也扯起了大幅横标语，声称要在少城公园召开群众大会。见此情景，我们决定在他们开会前一小时，召开我们的群众大会。时间大概是十月初。在他们开会的前一天，我们发动学校党、团支部动员群众，于次日午前九时，准时到达会场。来的群众约有七、八千人，改组派企图阻止我们开会，但我们不理，利用纪念碑台阶作主席台，迅速开会，并宣布游行。改组派想要阻止，也未成功。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从祠堂街、春熙路，到中山公园才解散，游行是成功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卖国行为，等等。后来改组派也拉来一、二百喽罗开会、游行。相形之下，群众说：前面游行的是共产党，后面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搞不赢共产党。可惜当时还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概念，作法仍不免有些“左”。

何盛明、李全洪录音、整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 忆王右木老师

何克希

一九二〇年我还没满十四岁的时候，考进了成都高师附中。王右木先生是高师的经济学教授，在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他曾教我们经济学，也便成了我们中学的老师。他是成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引路人，在他的影响之下，许多同学积极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右木先生身材适中，相貌雅秀，常穿一件竹布长衫，蓄一头拿破仑式的头发，讲话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他是当时成都学生运动的灵魂，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有着极深刻的印象。高师位于成都的皇城内，是成都学生运动的中心，皇城则是学生集会的中心。我们附中也在皇城内，每次活动我们都参加。学生集会时，只要王右木先生到来，无论大会小会，都会立即活跃起来，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我虽然年纪还小，知道的事情不多，但因学校的广大师生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我就能常见到王右木先生，并且得到教益。

我们增开经济学课程的时候，王右木先生还没有来，班上就有人传说他是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要同学们提防他，别被他“赤化”。但我们毕竟是中学生，一个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是不简单的，谁也不好去反对他。我则不仅不反对，且有几分欢

迎的意思。王右木先生来上课时，有的同学就在书桌上把两脚规架起来，再搁上一支铅笔，以象征对他的“瞄准”，抵制他的“赤化”。可是王右木先生在讲课中偏未直接提及马列主义，更没有讲共产党，也不是照着书本念，而仅是依照书本上的纲目独立地加以发挥。经过一段时间，同学们慢慢地就把两脚规做的炮架拆除了，逐步表现出对王右木先生心悦诚服的敬意。同学们的思想进步了，逐步地树立了革命的观点，认识了中国，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革命和改造。以后，我听说王右木先生要出川去，曾写了一封信给他，一共写了十七页，我真未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他说。我在信中表示了要同他一起去干那种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业的意向。我本来是在临毕业那年学校分文科和工科班时报名读工科的，我想学习自然科学、通过兴办实业来救中国，自从听了王右木先生的教导后，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实践马列主义才能使中国得救，便转而注重社会科学的学习和革命的实践。

我在高师参加学生运动，记得其中有一次是在北较场向军阀刘存厚请愿。时间是在冬天，我们到北较场时天已向晚，天气很冷。刘存厚不肯接见，经多方交涉，才允许派代表进去。代表进去后，时间拖得很长，我们在外面冻得要死，大家都愤慨，叫骂不已。我们鹤立寒风之中，彼此背靠着背，以御风寒。代表出来后，请愿仍得不到要领，不得已沿途高呼口号而回。另一次是为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到省议会请愿。我们在议会得不到圆满答复，反动当局反而雇用一批流氓打手向学生进攻。我们便在议会楼上甩砖瓦反击。当场有许多学生受伤，王右木先生也负了重伤。

就在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结束时，反动当局便强迫学校把王右木先生解聘了。这的确是我们高师校同学们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 忆赵一曼同志

郑 则 龙

### (一)

一曼同志本名李坤泰，号淑宁。“赵一曼”是她在东北抗联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时的化名。

她的老家在宜宾白花场附近的徐家乡白杨嘴，出身于地主家庭。她从家里出走时，是她的大哥李席儒当家。李席儒的思想，也和当时一般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一样，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他对一曼进城求学的要求，极端反对，一口拒绝。按照“有儿对贫亲，有女攀高门”的陋俗，她大哥便打算替她寻找一个有财有势的婆家。于是上门议亲的媒妁络绎不绝。有些媒人被一曼骂走了，可是席儒财势迷心，仍一心要把她嫁出去。

一九二五年冬末，一曼终于得到了她二姐和大姐夫、五姐夫的支持，决定出走。

一九二六年元月的一天，她大姐夫郑佑之同志对我说：“淑宁的大哥席儒想把她嫁出去，我同坤杰决定支持她从家里逃出来读书。组织上对这件事的意见怎么样？”那时淑宁已经是团白花场支部的成员。我回答：“我想组织上是不会不支持的。这也是我们反封建斗争的一项工作呀，何况淑宁还是自己同志呢！”当晚我就在团地委的例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同志们一听说支持